

### III. V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严复译词与日本译词

#### 1. 绪言

严复(1854—1921)生于福建省,世代以医为业,年轻时进入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877年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4年甲午战败后,开始在报刊上批评时局及政治,主张变法维新,展开启蒙运动。1898年出版《天演论》,风靡一世,对当时的知识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严复陆续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社会、逻辑方面的西方著作,建立了「信·达·雅」三位一体的翻译理论。1908年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致力于学术用语统一。1912年辛亥革命后,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亦作为约法会议员参与政治,起草宪法。晚年因参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受弹劾,在故乡福州病逝。

作为近代中国翻译西学的第一人,百年来有关严复的研究林林总总,无论从思想史、翻译史上的探讨,还是具体到个人事蹟的印证及史料发现,都已为严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域。<sup>1</sup> 如何寻找新的视点来发掘严复在近代中国的意义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近代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严复的翻译确实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比如,在翻译史上我们可以举出以下几种近代西学东渐的渠道:

- a 外国传教士的翻译
- b 国人直接翻译西文
- c 国人经日文转译

第一种是我们常说的明末利玛窦以来的西方传教士的西学传播,如其说是翻译,莫如说是西方知识经过他们的消化再作为新知识转化为汉语,《职方外纪》《西学凡》以及《博物新编》《万国公法》等均属于这类;第二种就是指的清末严复的翻译,即由中国知识分子独挡一面。这或许也可以上溯到明末1627至1630年翻译的《名理探》之类,但后者还不能算是直接译自外文原文。而第三种情况正是我们本文要和严复翻译来对照讨论的,所谓西学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管道。这里面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文→日文→中文」,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汉译本便是由德→英→日→汉转译而成的,这是一种历时的文本影响关涉,从知识传播这一角度来看,西方的思想和主义正是伴随著日语的新词一道进入到中国的。当然也有直接译自日本人自己执笔的文章,即「日文→中文」,如幸德秋水的《20世纪之帝国主义》等早在1903年便翻译成中文。而在严复的翻译时代,前后都面临著来自日文的概念和译词的冲击,故而呈现出近代翻译概念上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景象。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两个国家,知识份子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救国的方略求诸于西方,这样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同一西文文本下,中日两国各自可以同步独立翻译出两种文本,其相互之间有些是没有参照关系的,有些则又受到另一方的影响。比如:

---

<sup>1</sup>进入21世纪后,仅在日本出版的著书就有李晓东『近代中国の立憲構想 嚴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法政大学出版社,2005)和区建英『自由と国民 嚴復の模索』(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均是从思想史上分析其作用和贡献。尚有永田圭介『嚴復—富国强兵に挑んだ清末思想家』(东方选书,2011)一书,将严复比拟为「中国的福泽谕吉」。

表1 严复译与日文译本的对照

原著者	原书名	严复译	日文译	备考
赫胥黎(トーマス・ハックスレー)	Evolution and ethics, 1894	《天演論》陕西味经售书 处(1898)重刊	上野景福译《進化と倫理》 育生社(1948)	中文现译名《進化 論》
亞當・斯密(アダム・スミス)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原富》(1901) 上海南洋 公学译书院	石川暎作译《富国論》 (1888)	中文现译名《富国 論》
斯賓塞(ハーバート・スベンサー)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3	《群学肄言》(1903) 上海 文明编译书局	大石正巳译《社会学》 (1883)	中文现译名《社会 学研究》
約翰・穆勒(ジョン・スチュアート・ミル)	On liberty, 1859	《群己權界論》(1903) 上 海商务印书馆	中村正直译《自由之理》 (1872)	中文现译名《論自 由》
約翰・穆勒(ジョン・スチュアート・ミル)	A System of Logic, 1843	《繆勒名学》(1903)	大関將一译《論理学體系》 春秋社(1949年)	中文现译名《邏輯 学體系》
甄克斯(エドワード・ジェンクス)	A History of Politics, 1900	《社會通詮》上海商务印 书馆(1904)	《政治史》ジェンクス川 原次吉郎 講述, 松本書房 (1928)	日语现译名《政治 史概説》
孟德斯鳩(モンテスキュー)	L'esprit des lois, 1750	《法意》(1904-09) 商务 印書館	何禮之译《萬法精理》 (1875)	日语现译名《法の 精神》
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Primer of Logic, 1876	《名学淺説》(1908)		日语现译名《論理 学入門》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严复的代表译著《原富》(1901)、《群学肄言》(1903)、《群己权界论》(1903)、《法意》(1904-09)都有相应的日文译本存在,如:石川暎作译《富国论》(1888)、大石正巳译《社会学》(1883)、中村正直译《自由之理》(1872)、何礼之译《万法精理》(1875)等。从出版时间来看,严复的翻译虽在日本之后,且均为进入20世纪后的译著,但似乎并没有参阅过日本的译本。另一方面,《天演论》《社会通诠》《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翻译又早于日本。那么通过比较中日的两种译本,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东亚民族在应对西方新潮时用什么样的语词和文体来翻译之,译者着眼点和翻译的侧重面在哪里。由此来可以看看其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

实际上,日本学者铃木修次(1983)也说:「以名文家自任的严复在其初期翻译里竭力迴避使用日本译词,努力创作独自的新译。但不久,从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就不得不时而采用日本汉语译词,这一倾向到了约翰・穆勒的《繆勒名学》和孟德斯鳩的《法意》时则更为显著。」<sup>2</sup>同样,对于严复译词的去向,他也认为:「现代中国严复苦心翻译的词大多成为死语,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创造的「新汉语」,也就是严复译词被潮水般涌来的日本汉语词所淘汰了。」<sup>3</sup>

有关这一问题,通常总是被人们归纳为一点,就是:为何严复的译词最终不敌日语借词,在汉语里留下

<sup>2</sup>鈴木(1983)

<sup>3</sup>同上

的甚少。回答这个问题,前人已说了很多,这里可以举黄克武(2007)所概括的以下几条:

- 一,清末以来译自日本的书刊数量太多,形成一整套系统,这些书刊不但垄断了出版界,也包括了上游字、下游字贯穿为一体的语言体系,这些日本词汇在人们约定俗成之后,即难以抗拒。相对来说,严译书刊只在市场上占一小部分,同时严复又未能积极经营报业,因而在影响力上有所局限。
- 二,严译「太务渊雅,可以模仿先秦文体」,不易为人理解,以致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后很难受到人们的欢迎。
- 三,严复翻译好用单音词(如计学、群学、心学;又如以「联」来翻译 corporation、以「货」来翻译 commodity),不敌「复合词」(如经济、社会、心理、法人、商品)在意义传递上的丰富性。
- 四,严复喜用音译。<sup>4</sup>
- 五,严复所负责之译名统一工作迟迟无法有效推行等。

这里面,除了第一条作为当时出版界的大环境和日语的构词特徵不得不加以考虑以外,其他所举的都是严复个人的问题。第二条本是严复的长处,但这一主导方向随著汉语文体的变化,愈发格格不入了。第三、四条是具体译词的特徵,其译词方法上独创多于继承(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第五条仍然是与日语新词的剧增息息相关的,即日语多用既有的汉语来对译新概念,容易为国人所接受,而严复本人对待新词的态度则是另起炉灶,即尽量以新的形式来对译新概念。

所以,在考虑中国近代知识传播和概念的形成时,首先是中文自身的翻译,即严复的翻译与之前外国传教士的翻译之间的历史继承及统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次是如何甄别严复翻译中来自日本的要素和影响的问题。即从概念史研究上来看,中日近代概念产生的时间差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具体从语言史上来看,就中文本身来说,也就是如何克服 a 和 b 的翻译所产生的不同译词的历史差异问题。比如,同一英语 unit,早先的 a 译为「单位」,而 b 的严复翻译虽然时代靠后,却不去继承 a 的译法,而是另外新闢音译词「么匿」,最终「单位」一词反倒作为经由日本的 c 再次被采纳。

因为日本在其自身的近代概念形成的发展上,又有来自中国的 a 的影响,亦即通过汉译西书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所以对于同一外来概念会出现中日两种不同译法,例如「共和(日)一民主(中)」「裁判(日)一审判(中)」或「越曆(エレキ)(日)一电气(中)」「舌密(日)一化学(中)」等,在一段时期同时存在于日语中,然后才开始意义分化或先后替代,形成今天这种格局。也就是说经日文转译的 c 反倒是含有直接吸收 a 的成分。

由于日文在明治时期的翻译文体多使用所谓汉文训读式的「普通文」,<sup>5</sup>故汉字语词的使用可占文章的

<sup>4</sup>杨红(2012)的研究将《天演论》的译词分类为下表,以显示音译词为意译词的三倍,但在「现仍使用」一览表里仅举了两个音译词,且形态判断的标准过于主观了些。

译法	译名类	数量	译词例
意译	意译词(造字)	38	进化,名学,生学(生物学),理财之学(经济学),爰力(化学亲和力)
音译	音译词	119	歌白尼(哥白尼);斐利賓(菲利賓)
	总计	157	
	现仍使用	35	歌白尼(哥白尼);斐利賓(菲利賓)

<sup>5</sup>明治至大正时期广泛使用在报章杂志上的以汉文训读的语法体系为主的一种文言文。

70%以上(见第1章), 所以其翻译中也必然出现大量的汉语语词, 这就是与我们关注的问题相关之处: 相比中文译本, 同样使用汉语语词来翻译的日文译本, 会出现哪些语词上的差异呢? 直接译自西文的严复的翻译和经由留日学生根据日文文本的再翻译后, 这两股潮流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相互作用, 经过了几十年的磨合后, 会给我们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里, 我们主要以严复为代表来讨论进化论翻译和流传过程中中日两种译词的揉合及取舍的问题, 从近代中日语言交流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语新词在当时的处境, 并通过比较来发现严复翻译的独特之处。

## 2. 进化论传播过程的中日语词揉合

### 2.1 「天演」与「进化」

上文表1所示, 严复的《天演论》出版于1898年, 而在这前后日本已经翻译过不少赫胥黎的著作, 如:《生种原始论》(森重远, 1879)、《科学入门》(普及社, 1887)、《通俗进化论》(金港堂, 1887)、《进化原论》(丸善, 1889)、《生物学》(金港堂, 1890)、《进化论大意》(高等语学文库第1编)(语学文库刊行会, 1910)等, 但严复《天演论》所依据的底本似乎没有被翻译过来。尽管如此, 日语中的有关进化论的概念及译词也基本上是在1879至1890年这个时段确定下来的。铃木修次在其所著的《日本汉语和中国》(中公新书, 1981)一书中, 其中专设一章「進化論」の日本への流入と中国)讲进化论在日本的流传以及与中国的关涉, 这里当然论及到严复的《天演论》, 且特别关注中日两国在引入进化论过程中的翻译语词上的差异问题, 李冬木(2013)将该论文中所涉及的中日双方有关进化论方面的语词整理为下表2, 以便于对照参考:

表2 《日本汉语与中国》所见译词对照一览表

原 词	严复译词	日本译词	日本译词出处
evolution	天演 / 進化	化醇、進化、開進 進化、發達	哲学字彙I、II 哲学字彙III
theory of evolution		化醇論、進化論	哲学字彙I、II
evolutionism		進化主義、進化論	哲学字彙 III
evolution theory		天演論 進化論	動物進化論
struggle for existence	物競	競爭 生存競爭	哲学字彙I 哲学字彙 II
selection		淘汰	哲学字彙 I
natural selection	天擇	自然淘汰	哲学字彙 I
artificial selection	人擇	人為淘汰	哲学字彙 I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適種生存(生) 適種生存(生)、優勝劣敗 適者生存(生)、優勝劣敗	哲学字彙I 哲学字彙II 哲学字彙 III

\*《哲学字彙》先后出有三版, 初版为1881年, 再版为1885年, 三版为1912年。

我们由此表首先可以看出一点: 在《哲学字彙》初版(1881)时, 日本进化论方面的译词已经基本完善。在日本, 进化论的引进要早于中国, 1877(明治10)年在东京大学任教的美国人爱德华·莫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 1838-1925)便开设讲义介绍生物进化论, 「进化」一词也最早出现在东京大学法理文三

学部编纂的《学艺志林》第 14-17 册(日就社, 1878)上, 说的是「創世地質進化三説ノ歸一」。这之后, 同为东京大学教师的井上哲次郎与有贺长雄编辑出版的《哲学字彙》(1881) 马上就收录该词, 这既是一本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术语辞典, 对当时鼓吹进化论的人来说, 又是一本将东京大学洋教习的讲义尽快转化为日语的一本便捷手册。<sup>6</sup>紧接著, 时任东京大学法文理三学部总理的加藤弘之(1836-1916)也在 1882 年就出版了《人权新书》, 竭力主张抛弃天赋人权论, 开始转而提倡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 为日本走向国家主义而张目。<sup>7</sup>与此同时, 1883 年爱德华·莫斯用日语出版了《动物进化论》, 而有贺长雄又出版了《社会学》(卷 1 社会进化论, 卷 2 宗教进化论, 卷 3 族制进化论, 东洋馆, 1884), 一时间, 以东京大学为主的进化论之风吹遍了扶桑大地。<sup>8</sup>尔后, 日本出版的英和辞典等均采纳了《哲学字彙》(1881)的译法, 彰显出官学(东京大学)的威力。如:

《英和字彙〈再版〉》(1882) Evolution 进化

《学校用英和字典》(1885) evolution 进化

《汉英对照いろは辞典》(1888) ひらけすすむこ汁(世等が)、すすみゆく。进化。

Development; evolution, to develop.

著名评论家, 出版人德富苏峰也在「進化論は何ぞ」(何为进化?) (『静思余録』第二册、民友社、1895) 一文中反复诠释其意义:

進化は勢力にあらず、方法也。原因にあらず、法則也。故に人若し進化に放任せば、人生に進化なき也。社会に進化なき也。人此れが勢力となる、故に進化は方法として存する也。人此れが原因となる、故に進化は法則として存する也。別言すれば革新人を導くにあらず。人、革新を導く也。(进化不是一种势力, 而是方法; 不是原因, 而是法则。故人若听任进化, 则人生无进化也, 社会亦无进化也。人是其势力, 故进化只作为方法存在; 人是其原因, 故进化作为法则而存在。换言之, 不是革新引导人, 而是人引领革新。)

由上可知, 在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之际, 亦即甲午战争后, 来自日本的这股进化论之风有没有吹到中国还是值得再仔细探讨的问题。上述表 2 的另一特徵是严复的《天演论》也用了「进化」一词, 据黄克武(2014)的研究, 「早在 1895 年严复的文章之中就有「进化」一观念, 其意涵为进步到文明与教化之阶段的意思, 包含了人类在物质、组织与精神上的成就」而且, 该研究还指出: 「《天演论》定稿本出现了六处「进化」, 为严复 1895-1897 年阅读、翻译斯宾塞、赫胥黎的著作时所创造出的词汇, 与日译新词无关, 应是「不谋而合」」。当然, 对这种「偶合」说还是可以再商榷的, 有没有来自日文的影响是要通过更为详尽的调查才能得到确证的, 但至少在推崇德富苏峰文章的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17 册(光绪 22 年(1896)12 月 11 日)里就已出现过三次「进化」, 且均是译自日文的报刊。<sup>9</sup>所以我们很难排除严复使用来自日文「进化」一词的

<sup>6</sup>真田治子: 「明治初期洋書教科書の副読本としての『哲学字彙』—東京大学洋書教科書及びフェノロサ講義受講ノートとの比較(第 3 2 1 回日本近代語研究会, 2015 年 2 月 28 日)」

<sup>7</sup>王道还(2009): 《天演论》原著文本及相关问题, 《新史学》第三卷, 中华书局。

<sup>8</sup>其他翻译作品中也频频出现「进化」一词: 如斯宾塞著『道德之原理』(须原铁二译, 1883)里有「行為ノ進化ヲ論ズ(論行為の進化)」, 莫斯的『動物進化論』(1883)里也有「動物種族ハ同一元祖ヨリ變遷進化(动物种族由同一祖先演变进化而来)」等。

<sup>9</sup>「生物之成育, 本非有进境, 惟有变境耳, 然进境实在变境之中, 则社会之进化于善, 亦当常求之于变化之中也。」「论社会」译大阪朝日报西十二月初十

可能性。

在严复后来的文章中,常将「天演」与「进化」两词并列使用,1913年的〈天演进化论〉(《严复集》第二集 309-319)的文章题目便是一例。<sup>10</sup>

与「进化」相对应的「退化」也在 19 世纪末作为明治时代的新词先在日本开始使用,它对应英语的 degeneration。如:ワイツマン著《进化万物退化新说》(小川堂,1889)里说:「一生ノ間ニ多少ノ退化アリト(一生之间会有些退化)」;而中文也是出现在 1897 年 1 月 13 日的《时务报》上:「有退化于不善者、亦在胚胎于变化之中。」,上面举过的严复的〈天演进化论〉(1912)中也用了「民种退化,渐丧本来」的说法。

「天演」和「进化」实际上在 20 世纪初都成了中文里最为灿烂的语词,我们通过当时所编的两本英华辞典的收录情况,来看看它们的定位: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里有三处英文词下使用了「进化」译词:

(1) darwinism: The doctrine of Darwin, as regards especially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 达尔文之天演说, 进化论, 天然淘汰说

(2) Anamorphosis: The change of form throughout the species of a natural group of animals or plants, in the course of time, (生物)渐进, 进化

(3) Cosmism: A philosophy of things which grounds itself on the doctrine of evolution, (哲)宇宙论, 宇宙进化哲学

在例(1)里将「天演说, 进化论」并列在同一概念下;例(2)表示生物的「进化」;例(3)则反映了新的哲学领域。

而另一本赫美玲的《官话》(1916)则对译更多的英文概念:

Advance v. t. to make progress / 进化

Develop v. i. by evolution to a more perfect state / 进化(新)

Development n. ~ theory / 进化论(新)

Evolution n. same as evolve, v. i. / 天演(新); 进化(新)

Evolve v. i. to a more perfect state / 进化(新); 进化天演(部定)

Natural a. ~ elimination / 天演淘汰(新)

Selection n. Natural ~ / 天演淘汰(新)

Phyllogeny n. 种族进化论、系统护生

我们注意到这里把「进化天演」视做一个整体概念,并赋予「部定」的标籤予以认可,这与严复自身为学部名词审定会的负责人有关(第 4 节详叙),而来自日语的「进化」「进化论」和中日混合的「天演淘汰」这里均作为新词看待。

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掀起天演论高潮的时候,除了「物竞天择、民力、民智、民德等众多全新的概念术语」之外,实际上还有一批日语辞汇在起著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类词在后来的文章中反到呈后来居上之势,成为宣传鼓吹进化论时不可缺少的词藻之一。

<sup>10</sup>当然该文里已经出现不少日文新词了,如:「哲学、生物界、社会、细胞、有机、有机体、团体、自由婚姻、宗教、生理学、制限、义务」等。

## 2.2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时代的最强音

胡适《四十自述》(1931)云:《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瞭解赫絮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瞭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著许多少年的心和血。

11

《天演论》正式出版不久,不少小学教师就拿它做教材,中学教师往往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作文题目。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理还被有心人编入启蒙教材,如庄俞编撰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 1903 年版)。「物竞天择」、「淘汰」、「争存」、「优胜劣汰」等术语不仅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和喧腾于报章的熟语,而且被广泛用作人名或学校名称,如「胡适之」、「孙竞存」、「杨天择」、「争存女子学堂」、「竞化学堂」、「竞存初等小学堂」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千古佳句,不但一语道尽自然奥密,也给胡适先生取了名。

12

或许正因为如此,至今很多人都认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两个词是经严复之手创造出来的。然而,实际上在《天演论》的通篇里我们只能找出「物竞天择」(对译 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说法,其他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并非严复所造,而是借助了另一股力量,即来自日语的表述。美国学者浦嘉璠(James Reeve Pusey)曾认为「优胜劣败」是由梁启超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而并非严复自己的翻译(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63),从先行研究来看,其观点可能是基于上述铃木修次的文章所作的判断,或是受前人研究的启示,如《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識人— 严复と西洋—》(本杰明·史华兹著 平野健一郎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就说到:「但他(严复)造的新词大部分没能竞争过日本过来的新词,最终在中文里消失。」对于这点,皮后锋《严复评传》(2006)则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实际上严复在 1898 年 6 月已使用过「优胜劣败」一词。<sup>13</sup> 我们检索其原文(〈保种余义〉《严复集》第 86 页)为:

英达尔温氏曰:「生物之初,官器至简,然既托物以为养,则不能不争;既争,则优者胜而劣者败,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

这里的「优者胜而劣者败」也可以解释成四字格「优胜劣败」衍化出的短句。而「优胜劣败」最早出现在前面提到的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穀山楼,1882)里,其扉页上就赫然印有作者的手书:「优胜劣败是天理矣」,该词亦在书内反复使用,予以强化。

图 1 加藤弘之《人权新说》扉页

据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2008)介绍,1882 年加藤弘之发表了直接向自由民权派挑战的《人权新说》(1903 陈尚素译,译书汇编社出版)一书。他认为,



<sup>11</sup>《四十自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5年版,59页

<sup>12</sup>此段描述引自皮后锋《严复评传》389页。

<sup>13</sup>上揭书第389页脚注3

天赋人权本来就没有真正存在的证据，因为它是从学者的妄想生出来的，他以属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来驳斥天赋人权论，认为动植物界的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等进化现象，是「优胜劣败」的「永世不易的自然规律」和「万物法中的一大定规」。他的《人权新说》出版后的第二个月，即 1882 年 11 月，《邮便报知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朝野新闻》、《时事新报》、《东京经济杂志》等报刊，接连刊登了批判的社论和文章，这些文章不久编印成了好几种《人权新说驳论集》。1893 年的《强者的权利竞争》一书，将《人权新说》一书的第二章「论权利的发生和增进」加以发挥，认为权利也是由于优胜劣败的竞争而逐步增进的。指出在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生存竞争中，为强者之权利而进行的竞争是最多而又最激烈的，而且这种竞争不只是为了增大我们的权利自由，而又为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所必需。这种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优胜劣败」的观点，引起当时留日学生的重视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该书 1901 年由杨荫杭译为《物竞论》，首先在 5 月 27 日《译书汇编》第四期、7 月 14 日第五期和 10 月 13 日第八期上连载。1901 年 8 月就由译书汇编社出版单行本，销路颇好，1902 年 7 月由上海作新译书局再版，1903 年 1 月又由作新社图书局出版第三版。<sup>14</sup>加藤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其术语也基本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

这一时代背景告诉我们，本来「优胜劣败」一词是指生物在生存竞争中，竞争力强者取胜，得以生存；竞争力弱者失败，被淘汰。这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后被加藤错误地应用到人类社会上来。故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植木枝盛在其《天赋人权辩》（1883）第五章里就对之进行反驳，他说：

人間社會ノ運行ハ単ニ優勝劣敗トノミ云ヒテ言ヒ尽ス可キニ非ラス（人类社会的运行不单凭一个优胜劣败就能囊括的）。

这一词在日本当时的报刊杂志广泛使用，当然也会引起在日的梁启超的注意。实际上，在《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 年 12 月 23 日]）里，他就在〈续变法通议〉中开始使用这一表述：

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所朘削。

或曰：如子之言，则自五胡北魏辽金元以来游牧之种狎主中夏，而蒙古之兵力东辖高丽、北统俄罗斯、西侵欧洲、南吞缅甸越南，迫印度阿剌伯回回之种，抚有希腊罗马西班牙印度之地，峨特狄打牲之种亦曾蹂半欧，然则优胜劣败之说未可凭，而子所忧者特过虑耳。（「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但细查《清议报》中的 19 处用法中，有一半均是出自日文译文，比如有译自日本流行小说《佳人奇遇》<sup>15</sup>的例子：

声言曰。优胜劣败者。天之数也。（原书日文为：声言シテ曰ク優勝劣敗ハ天数ナリ）

亦有译自政论文的，如《清议报》第十四册（光绪二十五[1899]年四月一日）刊登的望月莺溪的〈对东政策〉一文的开头就使用了「优胜劣败，适种生存」的说法，我们注意到其夹注里将之解释为「即天演论物竞天择之说也」，这抑或可视为一种对译，《清议报》里常常用这种对译来解释日本中的「汉语词」，故此亦被作为判断是否为日文词的一个指标。<sup>16</sup>另据黄克武（2014）所引，1899 年 9 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三十册上撰写〈放弃自由之罪〉一文，谈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时，亦在其后加一注解：「此二

<sup>14</sup>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年 3 月

<sup>15</sup>原文《佳人之奇遇》由东海散士（1852-1922）原名柴四郎出版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十二月。此译文出现在《清议报》第三十册（1899 年 9 月）里。

<sup>16</sup>参见李运博《中日近代辞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语群学之通语,严候官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译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今合两者并用之,即欲定以为名词」。

这里也是一种中日比较,承认日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对应严复的「物竞天择」,并将「适者生存」也视为严复所译,而实际上该词也是在日本新造的词。「适者生存」应该是由「适种生存」变换过来的,如前所述,早在《哲学字汇》初版(1881)里就已经将「适种生存」对译为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了,当然除了用于生物界外,一般社会里也开始多用此词,如:日人森笛吉所著《文明の目的》(1888)一书多改用「适者生存」,其后该词得以广泛应用,还有的加上了程度副词「最」的修饰,如:达尔文的《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经济杂志社,1896)第四章的题目就是「自然淘汰即ち最适者生存」,将之与「自然淘汰」又划上了等号。

由此看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一中日揉合的表述出自梁启超,他在后来的文章里也时用严复的「物竞天择」。如:《新民论》第六节说:「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衝突,国与国不能不衝突。」或两者并举,如《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绪言》:「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苟不自新,何以获存……故撮录其学说之精华以供考鉴焉。」

严复译《社会通论》(1904)亦开始称之为「公例」:「中西政教之各立,盖自炎黄尧舜以来,其为道莫有同者,舟车大通,种族相见,优胜劣败之公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乃目论肤袭之士,动不揣其本原,而徒欲模仿其末节。曰是西国之所以富强也,庸有当乎!」

康有为《大同书》丁部也是将之与天演论并提称:「就优胜劣败天演之理论之,则我中国之南,旧为三苗之地,而为我黄帝种神明之裔所辟除。」

除了这种论说文外,清末小说里面也开始用这一词,似已成为一个反映时代特徵的流行表述。《女媧石》云:「登此 20 世纪活泼之舞台,见此优胜劣败之结果,欲解决此独一无二之问题,下一个圆满无缺之定义曰:国民教育,个人教育而已」。《痛史》(1903)第一回里也说:「既有了国度,就有竞争。优胜劣败,取乱侮亡,自不必舜。」连《九尾龟》(1910)都有例子称:「秋谷道: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没有什么说的。」春树道:「优胜也罢,劣败也罢,你且把昨天晚上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

从语词结构来看,相对于中文的二字译词(如:天演、物竞、天择等)多为主谓结构(即可延伸为句),而日文里的二字词(如:进化、开进、竞争、淘汰)多为并列结构。的确,四字格的「优胜劣败」与「物竞天择」都同样是主谓结构,虽然前者是源自日本的说法,但国人并不感到生疏,至今没有见过什么人对这一说法有何疑义。而且,「适者生存」也是主谓结构,这种叙述性的结构是句子的浓缩,与后来的「生存竞争」「自然淘汰」并举,成为中国推行天演论之时必不可少的词藻。

### 2.3 「生存竞争」「自然淘汰」及「弱肉强食」

这两个词也是最早出现在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1882)里的,如:

抑進化とは蓋し動植物が生存競争と自然淘汰の作用により漸く進化するに随て漸く高等種類を生ずるの理を研究するものにして(进化就是研究动植物因自然淘汰的作用随啄逐步进化而产生出高等种类的道理)

作者先举出「动植物ノ进化」过程中有「自然淘汰」和「人工淘汰」两种,动植物因这两种作用而产生「优劣等差」,然后为成长而相互竞争,优者击败劣者以获得独自的生存仍「是永世不易之自然规律,即万物法之一大定规」。故将之称为「优胜劣败的定规」,且其结果总是符合这一规律的(而テ其結果タルヤ常ニ必ス優勝劣敗ノ定規ニ合セサルモノハ絶テアラサルナリ),并一再强调「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之理」。

这两个词不光常并列使用,还多与「适者生存」同现一文,如:日本在翻译达尔文的《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経済杂志社,1896)时,就已经把这对词放在一起论。既论及「生存竞争与自然淘汰之关洗」,又说「自然淘汰即最适者生存」。而饭塚啓著《植物学新论》(帝国百科全书,第72编,博文馆,1901)里就有「适者生存,生存竞争」的说法,后来又加上「自然淘汰」一词,构成了一个类义语义场。如:岩崎重三著《进化论者ダーキン》(洛阳堂,1920)第六章的题目就是「自然淘汰适者生存」。

早在有贺长雄著《社会进化论》(牧野书房,1887)第四章就将之用于社会科学方面:

社會發生の相互要素即ち生存競争の理に依て協力分勞する人類の聚合の起る次第(社会形成的相互要素在于依靠生存竞争的原理来实现协作分工的人类聚合)。

随后,加藤弘之的《道德法律进化の理》(博文馆,1900)里也说:

優劣兩階級の間に起る自利競争即ち権力競争及び其自然淘汰の必然結果(这是优劣两阶级之间为自己利益的竞争,亦即权利竞争及其自然淘汰的必然结果)

日语里用的是「人为淘汰」和「自然淘汰」这一组词,而当时的中文里多用「天然淘汰」来表述后者。当然,「自然淘汰」的对象也是由生物界扩大到人类社会的。如:十时弥著《社会学撮要》(普及舌,1902)专设一章名曰:「社会中的自然淘汰」,再往后如宗教,思想,包括金融等都可用这个词来表述了。

另有「弱肉强食」一词,也是这一时代的显词。原本出自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弱之肉,强之食。」,明代亦有刘基的〈秦女休行〉:「有生不幸遭乱世,弱肉强食官无诛。」,到了近代多比喻弱者被强者欺凌,弱国被强国侵略。故在强调社会进化论时也常常与上述几种表达构成一种类义概念,比如:日本的《朝日新闻》1885年以后不断出现该词,1886年1月29日的社论〈交际论〉中亦与「优胜劣败」同现一句,强调曰:

弱肉強食一日安寧なかるべくして優勝劣敗の世の中となるべし(弱肉强食无一日安宁,必将成为优胜劣败的世界)

豊崎善之介著《社会主义批评》(警醒社,1906)也说:

競争は弱肉強食にあらず自然界の微妙(竞争不是弱肉强食,而是自然之所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个词频繁使用,似乎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连动而起。<sup>17</sup>比如中文里,陈天华的《狮子吼》(1905)便是叙说天演论的原理,阐明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以为世间痴迷者当头棒喝。而康有为《大同书》乙部第二章也说:「其强大国之侵吞小邦,弱肉强食,势之自然,非公理所能及也。」都是这一用法。

如果单纯按年代来调查该词在中日两国的同步使用频率的话,那么在近代「弱肉强食」一词恐怕反倒是由日文先将该词「启动」「激活」后再传回中国的。

20世纪初,上述各词均在中文里使用,实际上在赫美玲的《官话》(1916)里都有收录,其标记亦可视

<sup>17</sup>参见陈力卫:〈‘帝国主义’考源〉《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三期,2012年12月

为当时的基本认识。如：

Survival 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优胜劣败（新）、适者生存、优存劣亡（部定）

Darwinism n. 自然淘汰（新）适者生存（新）优胜劣败

Strong Strong devour the weak, 弱肉强食

也就是说，除了没有标记的「弱肉强食」为一般通用者外，从日语过来的「优胜劣败（新）、适者生存（新）、自然淘汰（新）」都一概视为新词，还特意造出一个模拟「优胜劣败」的「优存劣亡」来区别之并作为「部定」，可见参与学部审定名词的严复还是很在乎来自日语的译法的。

由以上可知，在中国进化论的传播流布当中，严复的功绩为大，其翻译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但来自日本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日语的进化论用语实际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加藤弘之喊出来的口号：「优胜劣败是天理矣」，将「优胜劣败」视为不容置疑的「天理、定规、公式、公例」，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氛，强力推动了进化论思想的普及。中文亦同出一辙。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严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中，「雅」的尺度是否意识到了日语译词的存在？是否因此而成为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人排斥和抵抗日语新词的一种理论支撑？同样反过来看，在这种抵抗意识最为强烈的时代，为何同为来自日语的「优胜劣败」等四字格反倒没有遭到任何阻碍便顺利地进入到中文语境中并被反复使用呢？换言之，必须排斥抵制的日语词和能够接受的日语词在构造上及意义上到底有何不同？同样，严复的译词究竟对中国社会影响到何时、何处？这些疑问都是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探讨的。

### 3. 所谓「雅驯」尺度的伸缩

#### 3.1 传统的「雅驯」与严复的「雅」

中国传统的「雅驯」多指文章的层面，如，六朝时代的《华阳国志》序云：

道将乃独能援经据典，辨析群言，以一之于中和，而文之以雅驯；非学识兼至，能如是为乎？

北宋的《朱子语类》也说：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语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行年三十九，岁莫日斜时。孟子心不动，吾今其庶几！」此乐天以文滑稽也。然犹雅驯，非若今之作者村里杂剧也！

仅就字面上而言的也有，如，宋·范成大的笔记《吴船录》里说：

今日山后老人村耆耄妇子辈，闻余至此，皆扶携来观。村去此不远，但过数绳桥。俗称其村曰僚泽，余以为不雅驯，更名老宅。近来盐酪路通，寿亦减。

即将俗称「僚泽」更名为雅驯的「老宅」。再有讲文章作法的，明·顾炎武的《日知录集释》说：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后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

从以上看来，传统的雅驯还是讲究文章格调是否协调，语词搭配是否贴切。在 19 世纪的英华字典的对译中，也是多拿 Elegant 来对译的，如：

his style is easy and elegant 其文雅驯

这一例句自麦都思《英华字典》(1847-48)到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69)再到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2)都被延用,进入20世纪,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也有以下对译:

elegantly written, 雅驯之文, 文词工雅

颜惠庆本人对「雅驯」的看法,反映在《英华大辞典》(1908)例言中,在涉及到辞典编辑时,他说:

溯字典之辑。远则一二十载。近亦三四五年。西学之探索日精。字典之程度日上。先所摭拾。类多巷语街谈。暨市间贸易之套词。国际镗移之公牍。势不能尽出于雅驯。今者文明类多输入。凡泰西之科学美术。博取兼收。推而彼之新思想新名辞。散见于我华文字者。尤比比皆是。是编罔不分类著录。天演所谓同类争存。存其最宜之道。固如是耳。

也就是说巷语街谈及贸易之套词、公牍等收集来的语词「不尽出于雅驯」,而「新思想新名辞」反倒不在此列,且「罔不分类著录」,听由其「同类争存,存其最宜之道」。

由此可见,这一时代的「雅驯」观多为传统的,并不拿它来排挤新名词。

那么,在严复所处的时代,这种雅驯的意义何在?严复的「雅」和抵制新名词有没有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它也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文体层面的;一是语词层面的。前者是严复为文的目标「乃驳駁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吴如纶),后者则是广为传颂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可以看出严复在将西方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上所作的努力,所以,严复的「雅」就是与中国传统的典范的古文相结合,实际上亦可以视为抵制文体上西化的一种形式。

### 3.2 抵制日语新词的一种说辞—「不雅驯」

有关日文新词的「不雅驯」以及在清末民初所遭到的抵制已经有了不少研究,见罗志田(2001)、黄克武(2007)、沈国威(2007)、黄兴涛(2009)、桑兵(2012),最近又见章清(2015)的论题,似乎不可避免地都举到张之洞在1904年1月13日提出的《学务纲要》中的一段话:

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複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衝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

这里先强调「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sup>18</sup>,却没有举出例子来,而其他三类则皆不可取:

- 甲. 欠雅驯: 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
- 乙. 同形异义: 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衝突、运动
- 丙. 舍熟求生: 报告、困难、配当、观念

<sup>18</sup> 《纲要》又据外国成例来增强其说服力,指出「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而当时「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别,何得昧昧剿袭。」据罗志田(2001)。

据罗志田(2001),乡试课卷中「如改良、起点、反影、特色之属,概不准阑入卷端」,还有「因榜首用文明、野蛮字,经本司严批痛斥。」

黄兴涛(2009)介绍了康有为1910年8月5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其中亦语重心长地劝诫梁不要使用日文新词:「如手段、手腕(其他组织、目的、舞台、二十(世)纪)」,其后在《中国颠危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1913年7月)一文中,再次痛斥所谓「文字名词,且媚及日本」的「无耻可悲」现象,认为汉语里滥用日本新名词,是抛弃传统雅言,丢失国粹;学日本俚语,乃是语言上的退化。他举出的例子为:

乃并其不雅之名词而皆师学之,于是手段、手续、取消、取缔、打消、打击之名,在日人以为俗语者,在吾国则为雅文,至命令皆用之矣。其他若崇拜、社会、价值、绝对、唯一、要素、经济、人格、谈判、运动,双方之字,连章满目,皆与吾中国训诂不相通晓。

这里,又给出了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日文本为俗语,而我国则为雅文;二是最后一句「皆与吾中国训诂不相通晓」,亦即用传统的训诂学难以解释之。再有认为「文不成体」的有:「脑筋、起点、压、爱、热、涨、抵、阻诸力,及支那、黄种、四万万等字,纷纶满纸,尘起污人」除抨击上述新名词之外,还提到了「摄力」、「吸力」、「震旦」、「成线」、「血轮」、「以太」、「白种」等其他名词。后来集大成的就是留日学生彭文祖所著的《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了。其所抨击的新名词之数量最多也列出得比较详尽。包括「引渡」、「让渡」、「抽象(的)」、「具体(的)」、「积极(的)」、「消极(的)」、「动员(令)」、「场合」、「必要」等都难免其责。

这种矛头所指显然是另有衡量的标准,因为它排斥的似乎不限于日本新词,比如「震旦」为中国传统词,「脑筋、摄力、吸力」为早期传教士译词,<sup>19</sup>「崇拜、必要」也早出现在英华字典里了。<sup>20</sup>而「四万万」一词,康有为、梁启超都用,为何对之也要进行讨伐呢?

对「起点」、「压力」、「阻力」、「热力」的不满,是因为动词和名词的组合,在传统中文里容易视为动宾结构(如「读书,喝酒」),而新词中的动词多为偏正结构,这种结构的构词在汉语中本来就是不发达的,所以容易引起误解。<sup>21</sup>

后者可能是和数学上的单位改换有关。即是一种新旧之冲突。当时多用「四百兆」称中国人口,如汪康年〈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时务报》第十一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1896)说:「而我中国四百兆人之公惧也。」近代西方传教士合信编写的《博物新编》(1854)卷三〈万国人民论〉亦称「合计天下人民大约有九百兆(一百万为一兆)之数。」即指当时全世界有九亿人口,并在夹注中注明「一百万为一兆」。那么,四百兆(400+000000)等于四亿,而四万万(40000+0000)也等于四亿,本来所表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前者是旧的固有的说法,而后者则是新的单位换算。过去,一亿只等于十万,现在一亿等于万万了。<sup>22</sup>用新的说法表达,正是与近代西学数学接轨的结果,这一转换本身实际上是一种求新的表现。说到底,是对新概念新

<sup>19</sup>陳力衛:「明治の科学啓蒙家の苦心—「-力」、「-性」の接辞化へ向けて」『日本語学』2014年3月号。

<sup>20</sup>马礼逊英华字典(1822)里将「崇拜」作为 WORSHIP gods 的译词。马礼逊英华字典(1822)里将「必要」作为 NECESSARILY required 的译词。

<sup>21</sup>陳力衛:「語構成から見る和製漢語の特質」『東京大学国語研究室創立百周年記念論文集』汲古書院,1998年2月

<sup>22</sup>据《辞源》(1989)载:「亿之数有大小二法:其小数以十为等、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也。其大数以万为等、万至万、是万万为亿;兆,古代下数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中数为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上数以亿亿为兆。」但这种解释容易混淆具体时代的用法,莫不如看近代传教士马礼逊编的汉英辞典《五车韵府》(1815)更能反映当时的理解。其将这两个字分别解释为:「亿 One hundred thousand; 兆 A Million」,即亿为10万(100000),兆为百万(1000000),兆比亿多出一个零。

词整体的不满,加上甲午战败后的厌日情绪,一股脑都当作「不雅驯」来排斥。

### 3.3 双音节词与雅驯

古代汉语本来是「字本位」的,所以,「在康有为看来,汉字单音节构词作文(称为「单字成文」)其实很美妙,它不仅是汉文雅洁的基础,甚至也是其韵律节奏(称为「文调」)之完美得以保证的前提,而日本双音节词(称为「双字」)的大量引入,既「俚俗不堪,还致使传统汉文变得冗蔓。」<sup>23</sup>

前面第一部分提到,日语里的汉语词是中日语言交流的一个接点,汉语词所占的比例(单词个数)在整个明治期间始终保持在70%以上的历史最高纪录,只是在进入大正时期以后才开始逐渐减少至60%。而且,这类汉语词的增加主要体现在複音节词上,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前面所举的日文新词就可知道。相比之下,严复的译文特点是崇尚古文,他自己也在古文中探索,并以桐城派的传人自居。其结果译词中以字为单位的,即便是词,也是按主谓结构即句子的短缩型为主,如「物竞天择」「天演」「庶建」等,单纯的并列结构少。不像日文采用「自由,社会,文化,宗教」。尽管在时代上严复的译文较日文译本晚了近20年,但单音节的语词占的比例明显较複音节词高。反过来说,在近代的一段时间内,日语的複音节化进程要比中文更快。

尽管如此,「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学务纲要》1904),此话似乎是要承认有些日语新词也是可取的,因为日本人在创造新词时,也是从中文古典中找出其认为与西方概念较相近的语词来对译,应该是有共同的基础和要素。即以「用典」和「可训诂」为基本条件。这一点已有罗志田(2001)指出「其实日本人自己在造「新语」时也试图使之较「古雅」,而沈国威(2011)则从共通语义场上来阐述之,也就是在汉语汉文这一共同基础上应该是有共通的地方的。有些日语新词当时的人们感到唐突,尽管有许多意见,但还没有一棍子打死。所谓「雅驯」的判断似乎对此网开一面。如:

国粹 个人 简单 动産 方案 方针 觀念 汽船 素描 法定 哲学 义务 学位 学年 辩护士 不动産 看护妇 觀察点 寒暑计 胃溃疡 高利贷 国际法 所有權 立宪政体 共和政体 新陈代谢 一触即发  
陈继东(2011)举过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中采用「武士道」这一概念的理由:

武士道者,日本名词。日人所自称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驯,且含义甚渊浩,故用之。<sup>24</sup>

武士道等同于大和魂,无疑表明了武士道这一概念的特殊性。但是,作为无需翻译的汉字词汇,在梁启超看来,武士道除了其含义深广之外,符合汉语的「雅驯」这一十分主观的感受。<sup>25</sup>

这一点也印证了上述颜惠庆收录新词的态度。新词不是不可以用的,只是看本人的立场和态度了。当「雅驯」这一尺度消失后,连严复也开始大量使用日语借词了。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中期翻译的书里,双音节词也在不断增多,且新词也在使用。所以有人说这种雅只是一种「糖衣」,是严复的招来术。<sup>26</sup>

后人将「信达雅」视为三位一体的翻译理论,其实是给「雅」的解释留下了无限的诠释空间,只有鲁迅

<sup>23</sup>黄兴涛(2009)

<sup>24</sup>《中国之武士道》广智书局,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初版,(《饮冰室专集》「凡例」,上海,1932),页2。见陈继东(2010)。

<sup>25</sup>同上

<sup>26</sup>「他有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来术。」(王佐良〈严复的用心〉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982年6月,p27)

是不信这一套的,他的直译可以视为一种信念所致,即只有直译才能冲击这一套古老的话语系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接近西学的真实面目,而这一认识又正是经历了日本文体变化的洗礼所获得的。

#### 4. 严复译词对后世的影响

##### 4.1 「部定」与「新词」之争

严复的「雅」在当时固然受到士大夫们的称讚,其独到之处也有不少保留到至今。这与其本人身兼编定名词馆总纂有关。沈国威(2008)对严复在名词馆所做的工作有过详尽的考察,他指出,赫美玲(E. G. Hemeling)在编辑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官话)1916时,得到了严复审定的30000条「部定」,这一点在该辞典前言中也交代得很清楚:

标准科学术语(约30000条)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委员会在1912年为中国的大学制定的。这个委员会由著名的英语学者严复博士领导,所制定的术语在本辞典中用「部定」标出。这些术语涵盖了一下的学科:算数、代数、几何、三角法、逻辑、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国内法、国际法、宪法、历史、动物学、植物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生理学、动植物生理学、地质、物理学(力学、光学、声学、电学、磁力学、热学)、卫生学、医学。所标出的学科术语只是所制定术语的一小部分,因为全部收录这些术语将超过本辞典的范围。这些部定术语由于其间的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在收入本辞典之前没有由政府正式公佈。

但实际上,在赫美玲编的辞典里只收录了16000多条部定词,另外又加上的是自己设定的「新词」。该辞典所收的两者比例为:<sup>27</sup>

新词	部定词	总数
12059	16041	28100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部定词都是严复自己的译词,据沈国威的调查,部定词的来源有三:传教士系统的译词;严复译词;日本译词。传教士译词偏于化学、医学、製造领域,而严复译词固是偏于逻辑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日本译词则多是报章常见词。而罗志田(2001)指出,部定词里面收录日本译词,或许与王国维的加入有关:

1909年秋,清学部设立编定名词馆,严复为总纂,而王国维任协修。王任此职大约多恃罗振玉的援引,固非因此文之作,然其与严复同在馆中如何「编定」名词,当必有趣。其实若从新名词的社会使用看,到名词馆成立时,严总纂所代表的「造语」取向已基本大败于王协修所倾向的模仿日本派了。名词馆没能留下多少实际的成绩,亦良有以也。

这一方面说明严的「造语」与王的模仿日本有本质上的不同,也说明日本新词实际上是起着弥补严氏「造语」的作用。近来由黄兴涛(2013)发现的部分名词馆手稿,也反映出严复译词的局限性。他说:

此外,透过严复审改的这部原稿本,我们还可发现当年学部编订名词馆工作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每个学科只能靠个别编纂者努力,仅总校者严复一人最终把关而已,甚至连「分校」和「覆校」

<sup>27</sup> 这个数字可能要加以修正,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华字典数据库嫌示:全文搜寻(新)在1916赫美玲英汉字典,5651个词目下,共找到12309笔,全文搜寻部定在6507个词目下,共找到16125笔。也就是说两者的实际数字都有所增加,总数应该为28431,较沉国威(2008)的上述统计多出331笔。

的环节都没有设置，就更谈不上集体磋商和讨论审定的科学程序了。处于革命风起、王朝统治临近崩溃的边沿，清廷实际上已经没有耐心、经费和能力，来维持名词编订这样一类带有基础性质的科研工程。其进展和结局，实在也不是严复一个人的博学 and 负责与否，所能决定和改变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赫美玲辞典里另设「新词」，主要是吸收源于传教士的译词和日本译词。也就是说，无论是「新词」还是「部定词」都包括了日本译词，而严复的译词只出现在「部定」里，如果单就日本译词和严复译词比较的话，正如铃木（1983）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汉语里严复的译语已多被日语译词所替换：

严复的翻译从用词上来看，在中国已经成了古典了。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严译名著丛刊」卷末附有严复译词和原文的「译名表」，其注记标出的现代中国社会所使用的用语多与日语相符合，这也意味著日本汉语流入到了中文…

沈国威（2008）的结语也是：「保留至今的词大部分是中日同形词，即意味着这些语词的形成是中日语言交流、互动的结果。」

## 4.2 严复译词的断层

严复译词曾在《新尔雅》（1903）〈释计〉中出现一些，其后在对译辞典里很难找到，只有1908年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因有严复作序，故也能找出一些（如「庶建」），主要部分还是反映在上述赫美玲的辞典里了，后世留下来的并不多。其理由之一反映在严复对以往的英华字典的看法上。如其在《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1902）中自述：

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

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只是最早期马礼逊的华英辞典《五车韵府》，其后的辞典似乎没有利用过，特别是十九世纪规模最大的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日本曾被两度翻印，流传甚广，日语从中汲取了大量的汉语新词以充实其近代概念，<sup>28</sup> 而包括严复在内的中国知识份子反倒没有利用过。这一结果，导致了严复译词独创多于继承，我们通过比较严复译词和其他英华辞典的译词可以看出这一特点（见表4）。

表4 英华辞典与严复译词<sup>29</sup>

英華辭典 嚴復譯詞	1822 馬禮遜	1847 麥都思	1866 羅存德	1908 顏惠慶	1916 赫美玲
Astronomy 天学	天文	天文	天文、曆法	天文、天学、星学、曆法、通天文之人	天文学、星学
Biology 生物学			生活之理、生活總論	生活之理、生活總論、生物学	活物学（新）、生物学（新）
Body	身、身體	身、體、身體、	身、體、身體、肉身、	體、身體、形體、肉體、	身體（Physical）、身、身材、

<sup>28</sup>陈力卫：〈19世纪至20世纪的英华辞典与英和辞典的相互影响—中日近代新词往来的管道之一〉《翻译史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sup>29</sup>此表参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英华字典资料库」製作而成，特此鸣谢。



形	形體	肉身、肉軀、肢體、軀、躬、躲、形體、形身；質、形質、物	肉體、肉軀、躬、躲、臆、形體；物、質、物質、形質	身體靈魂；物、實體、堅質、堅形、虛形、浮質	肉身、身子、人體；機槽(新)團體(新)、羣、團(新)；正身、正幹(文)、物體(部定、Dynamics)
Chemistry 質學		丹煉之事、煉用法	煉法、煉物之學、煉物之理	化學、質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	化學(部定)、質學(新)
concept			稿	概念、意像、意影、意想、意見、意念	意想、意影、概念(部定、Logic)、觀念(新)、概觀(新)
Consciousness 覺, 覺性		自知之心	自知者、知者、心內知者、自知之心	悟才、覺悟、悟才、覺悟才(心自知、且知其舉動與感情之能力), 直接之知識、感悟、覺、覺、識、覺	權力之覺(部定)自覺(部定)羣覺(部定)陰覺(部定)覺闕(部定)集合意識(新)同類意識(新)意識流(新)蟄覺(新)
Democracy 庶建	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	眾人的國統、眾人的治理	民政、眾人管轄、百姓弄權	民主政體、民政、庶建	民主政體(新)、平民政治(新)、民政(部定)
Economics 計學				關理財學的, 經濟學的	富國策、經濟學(新)、理財學(新)、計學(部定)、國計、民生主義(新)
Logic 名學		明論之法、推論明理之學	思之理、理論之學、明理、明理之學、理學、推論之法	辯學、名學、論理學、是非學、推理之學、思想公理之學、理、道理、理由、論理	名學(新)、辨學(部定)、思理學(新)
Metaphysics 美臺裴輯, 理學	天地鬼神之論	理氣學	理學、理知、萬有理之學	哲學、理學、形而上學、萬有之學、心理學	形而上學、哲學(Philosophy)、心理學(新)
Philology 字學		詳字之學、詳文之學	話學、字語總知、詳字之學博理	詁學、語學、方言學、博言學	博言學(新)、言語學(新)
Psychology 心學			靈魂之學、魂學、靈魂之智	心理學、心靈學	心靈學(新)、心理學(部定)
Sensation 感		衷情	覺者、見者、衷情	覺見、感覺、知覺、官覺、覺畏懼、覺寒、見寒、麻木不仁	覺、知覺、官覺(部定)
Sociology 群學				社會學、交際學、羣學、世態學	社會學(部定、Economics)、羣學(部定)
Space 宇	虛空清淨, 虛空無有邊界	虛空清淨、空虛、空虛地方	地方、間, 空處、空地、空虛地方	空間、空處、場所、用武之地、空地、地位、遠、距、間、間距、距離、時間、時	地實(新)空界、空間、空地、地方

unit 么匿	單位	一、單一、單位、 奇	一、奇、單、獨一、 單位	(數與理)單位、準個、 么匿、本數	準個(箇)(新)、單位(新、 Math.)、麼匿(部定、Geom.) Economic ~ 生計上之麼匿 (部定) ~ quantity 么匿幾 何(部定)
---------	----	---------------	-----------------	----------------------	--

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严复译词的几个特徵。第一条「天学」和第四条的「质学」都置前人的译法而不顾, 仅被 1908 年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所采纳; 第二条「生学」和第三条「形」及第六条的「觉性」也都与之前的辞典无关, 最终形成一种孤家寡人的状态。下面再举几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点:

Democracy 译成「庶建」, 也只在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1908)里被采纳, 严复与编者的父亲颜永京为挚友, 在心理学及其他领域的译词上有过交流, 故为其子所编的英华大辞典写序。该词或许收在严复自己的「部定」里, 但至少没有被赫美玲收录。反倒是将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出现的「民政」设为「部定」, 而这个词亦是经由日本返回的。<sup>30</sup>

Sociology 译作「群学」是流传甚广的例子, 严复早在 1880 至 1881 年间初次接触过斯宾塞的学说, 1895 年他在《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中写道:「锡彭塞者, 亦英产也, 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 帜其学曰「群学」」。而斯宾塞在日本的解读, 大多当作自由民权运动的精神支柱, 他的 Social Statics(1851), 被日本译作《社会平权论》(松岛刚, 1881), 仅这一书名便成为蛊惑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动力之一, 「初版后受到读者的狂热欢迎, 其发行的版数超过了译者、出版者所预想的千百倍。」<sup>31</sup> (我们现在译成《社会静态学》似过于平淡), 实际上, 日语的「社会」的一连串意义用法曾经过梁启超等的传播, 原模原样被中文所采纳。早在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十册, 阴曆 1899. 2)中就有「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的对译注解, 同册〈本馆论说〉亦云:「资生学, 即理财学, 日本谓之经济学; 智学, 日本谓之哲学; 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 特意列举出了中日译词的不同。然而两年后, 在《和文汉读法》增补本中, 针对日语的「世态学」<sup>32</sup> 一词, 已经拿「社会学即群学」来作为中文译词对译之了, 反过来看「群学」则成了配角, 这种对译法的逆转同时也意味著中文原创译词「群学」的退潮。事实也的确如此, 严复到了 1903 年, 终于开始采用「社会」一词, 他将甄克斯的 A History of Politics 译作《社会通论》, 自序中亦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sup>33</sup>

Unit 如前所述, 早在第一本马礼逊的英华辞典里就译作「单位」, 然后一直被后来的辞典所延用, 也被日本的英和辞典所采纳, 但严复还是独具匠心地选择了音译的「么匿」, 并将之命为「部定」。的确也被伍光建的《最新中学物理教科书》(1904-1906)所采纳, 并用到二十年代。但最后, 「单位」反倒被当作「日本借词」又借回到了中文里。<sup>34</sup>

<sup>30</sup>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第 1 期, 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 政大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sup>31</sup>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3 月

<sup>32</sup>《哲学字彙》凡例中将之作为专业术语的分类之一。

<sup>33</sup>陈力卫:〈词源(二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 三联书店, 2013 年 4 月

<sup>34</sup>高名凯刘正燊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

## 5. 结语

严复自身所奉行的翻译方针(崇尚桐城文体),使得他不看好自明清以来的白话文,特别是传教士的翻译及英华辞典的对译,更不要说是译自日文的书刊了。前者是因为文体中多含口语根本看不上,而后者则似乎不屑一顾了,他在致友人心中忿忿不平地说:「上海所买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学界近况也。」<sup>35</sup>

我们通过比较可知,严复译词中基本没有利用十九世纪以来的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和英华对译辞典中的新词新概念。而这两方面反倒成为日本知识份子汲取西方知识的直接管道,它为日语灌输了新鲜血液——新词、新概念、新知识,这一血液经日本过滤后又被留日学生传回了中国。译自日本的各种书籍最终以量取胜,遍地开化,其实是有很多中文易于接受的成份。所以,所谓的日语新词能够迅速被人们所接受,并不单纯是「中日新语大战」,实际上其中不少成份就是中国自己的语词新旧大战。而说到底严复译词不敌日语借词的根本原因就是时代要求新的文体,而承载这一文体的又主要是複音节词。

1902年在《新民丛报》第一期中,梁启超评论严复的译文说:

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邈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积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后来,他也有一段评述自己文字的话: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sup>36</sup>

这其实正可作为本文的结论,所谓严复与梁启超的文体之争,最终还是要顺应时代对新文体的要求,也就是白话文的兴起所带来的各种语言上的问题,从语法变化到新词的吸收实际上都是由这一要求引发出来的。

### 参考资料:

山下重一:「ミル『自由論』の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初訳—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と嚴復訳『群個権界論』」『英学史研究』33,日本英学史学会,2000年

山下重一:「中国におけるミル《自由論》の受容—嚴復訳《群個権界論》(1903)(上)(下)」『国学院法学』38卷1,2号,2000年

山下重一:「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ミル《自由論》の本邦初訳(一) - (三)」『国学院法学』47卷4号,48卷1号,48卷2号,2010年

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2月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

<sup>35</sup>转引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76页。马勇整理:《严复未刊书信选》,《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8-59

<sup>36</sup>《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2页

- 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5月
- 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8月
- 永田圭介：『嚴復—富国強兵に挑んだ清末思想家』（東方選書）2011年7月
- 石井研堂：「精神学科の訳語」『増補改訂明治事物起源』下巻, 春陽堂書店, 1944年11月, 519-521
- 石田雄：「J・S・ミル《自由論》と中村敬宇および嚴復—比較思想史的試論」『日本近代思想史における法と政治』岩波書店, 1976年
- 米川明彦：「近代語彙考証6—進化論」『日本語学』2-9, 明治書院, 1983年9月, 114-117頁
- 平野健一郎訳：『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識人— 嚴復と西洋—』B. J. シュウォルツ著, 東京大学出版會, 1978
- 高田淳：「嚴復の「天演論」の思想—普遍主義への試み—」『東京女子大学附属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20号, 1965年11月
- 苏中立, 涂光久主编：《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 杨红：〈从《天演论》看严复的译名思想〉《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第31卷第5期, 2012年10月
- 李冬木：「「天演」から「進化」へ—魯迅の進化論の受容とその展開を中心」『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石川禎浩・狭間直樹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3年1月
- 沈国威：〈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新名词’之反应〉,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2号, 第109-112页。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 2007年3月出版。
- 沈国威：〈《官话》(1916)及其译词:以「新词」「部定词」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3号, 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 2008年3月出版。
-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彙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 166-168页
- 沈国威：〈严复与译词:科学〉《翻译史研究》第一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 陈力卫：〈围绕近代「新汉语」的一些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3期
- 陈继东：〈在中国发现武士道——梁启超的尝试〉, 《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7卷第2期, 2010年12月, 219-254页。
- 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 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6月
- 桑兵：〈清季变政与日本〉《江汉论坛》2012年5期第5-16页
- 徐水生：「翻訳の造語: 嚴復と西周の比較—哲学用語を中心に—」『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号, 島根県立大学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 2009年3月
- 高柳信夫：「中村正直と嚴復におけるJ・S・ミル《自由論》翻訳の意味」『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石川禎浩・狭間直樹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3年1月
- 章清：〈晚清中国接纳新名词、新概念遭遇的三重屏障〉《南方学术》2015年第4期
- 黄兴涛：〈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 2009年12月
- 黄兴涛：〈新发现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一部原稿本〉《光明日报》2013年2月7日
-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允晨文化, 1998年
-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 清末严复译语与和製汉语的竞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 2008年12月
- 黄克武：〈何谓天演? 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

9月), 129-187

鈴木修次: 「<進化論>の日本への流入と中国」 『日本漢語と中国—漢字文化圏の近代化』, 中央公論社,  
1981年9月, 168-214

鈴木修次: 「嚴復の訳語と日本の「新漢語」」 『国語学』 第132集, 1983年3月

樺島忠雄・飛田良文・米川明彦: 『明治大正新語俗語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4年5月

惣郷正明・飛田良文: 『明治のことは辞典』, 東京堂出版, 1986年12月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